

恽逸群文集

胡乔木題簽

江苏人民出版社

恽逸群文集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恽逸群文集》编选组

江苏人民出版社

恽逸群文集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347,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书号: 11100·143 定价: 3.15 元

责任编辑 戴金生



恽逸群同志

恽逸群全家合影

(一九五四年摄于上海)



恽逸群夫妇晚年合影

(一九七五年摄于常州)



恽逸群在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右下：恽逸群著作之一
《新闻学讲话》

序

匡 亚 明

恽逸群同志是我党的一个优秀党员、优秀学者和优秀新闻工作者。

恽逸群同志自一九二六年入党到一九七八年去世，经历了名副其实的坎坷的五十二年。他做过秘密的地下党的县委书记（江苏的武进、宜兴和浙江的萧山等县），又以隐蔽身分在上海、香港等地做过新闻工作，还以伪装身分打入日军机关做过情报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异常艰险、异常复杂的，但他都能机敏地以“出污泥而不染”和“临危不惧”的坚定信心，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这些工作过程中，他曾两次被捕，虽都以“证据不足”（这也是他机敏的一种表现）而未判刑，精神上的折磨是可想而知的。全国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理应该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应有贡献。但正当这个大好时机，由于党内有些同志在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特别是审干政策中缺乏实事求是精神，再加上“左”的错误（其中有的是好心办坏事，但也不乏存心办坏事的），非但没有使他得到应得的“人尽其才”的机会，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而且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从开除党籍，降级降薪，到逮捕囚禁，达十年半之久，最后被贬滴到一个中学做图书管理员，不列等级，月发三十七元生活费。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才调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仅数月，因身体衰弱不堪，终于在同年十二月含冤逝世。死后一年余，即一九八〇年才

得到平反。而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政策的话，死后是难能平反，更谈不上出版文集的。这一点，我想还是可以聊以告慰他于“九泉之灵”的！

在恽逸群同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坎坷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也无论是处于党外还是党内的顺境或逆境，都没有动摇过他对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因其代表真理而必胜的信念。这种高尚的品德，纯真的党性，是值得我们所有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学习的。处在四化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的前程已更为具体明确的大好形势面前，还有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甚至还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渺茫而彷徨，和恽逸群同志坚贞不贰的共产主义信念相对比，不是可以从中得到非常有益的启发和鼓舞吗？至于还有些同志或因工作分配不合意而不满，或因调级调资不称心而颓丧，比之恽逸群同志坎坷一生而仍对党的事业不懈不悔的崇高形象，难道不更可以从中得到意味深长的教益和鞭策吗？

恽逸群同志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见1973年7月8日给胡愈之信）“不为物移，不为己忧”，是多么响亮的誓言，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

作为一个忠诚坚贞、公而忘私、乐以忘忧、“不为物移，不为己忧”的优秀共产党员，恽逸群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恽逸群同志为什么能够在那样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五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坚信不疑，毫不动摇呢？这可能有许多原因，例如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对军阀官僚压迫的反抗，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忧虑，对陷于饥寒交迫困境的工农劳苦大众的同情，等等。这些原因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原

因，那就是他一贯的好学不倦的精神。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远大的理想境界和最广泛的现实运动，同时又是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理论和学说。“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文选》第2卷，第803页）那种认为只要读几本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记住几条现成结论，就算懂得共产主义，就算共产主义者，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要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光靠读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尽可能多地通晓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才能深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便是共产主义从人类知识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标准。”（《列宁文选》第2卷，第803页）人类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共产主义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这就是说，只有好学不倦、知识渊博的革命者，才能真正懂得共产主义，才能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步伐，不断巩固和加深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实际活动家和学者是统一的：走出书斋就是实际活动家，走进书斋就是学者。恽逸群同志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恽逸群同志在十五岁以前，就已经通读了《史记》、《通鉴》，并选读了前后《汉书》和《三国志》等书。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些书中固然有糟粕的东西，但也确有有益的东西，不仅从中可以领悟出国家兴亡的道理，从而激发出发奋图强的志气，而且一般地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陶冶自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例如上述他引以自豪的“不为物移，不为己忧”的博大胸怀，不恰好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概括吗！这种反映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高尚品德的一般准则，和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相结合，不就是坚贞不屈、无畏无惧的革命品格吗！当然，在十五岁以前，他不可能懂得这点。但到十五岁以后，特别是到了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就掌握了批判武器，可以在古书堆中和其

他一切文献资料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之为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从事学术活动服务了。

在学术领域内，恽逸群同志是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古今中外，无不涉猎。而且他是役书而不役于书，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从各种书本知识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他好读书，又善于读书，善于用书，所以读书虽多，但决非书呆子。他写了很多政论性文章，也写了不少学术性论文。尤可贵者，乃是在“四人帮”横行时，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针对帮派文人的谬论邪说，在僻处海隅的一个中学里孤独无助的条件下，默默地写下了一些有胆识的、揭露性的、极为精辟的文章，例如针对所谓“评法批儒”而写了《也谈儒家和法家》；针对“四人帮”帮派文人的下流文风而写了《论新八股》；针对“四人帮”新的造神运动的个人迷信而写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等等。这些文章即使在时过境迁的今日，仍保留着强有力的生命力。

恽逸群同志才华焕发，记忆过人。凡是他读过的书和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的情况（时事），都能牢记，一旦引用时，可以历历如数家珍地指证无误。对于民国以来的政局变革经过，更是如此。所以和他相熟的同志都称他为“活字典”。一九六八年他在一封致友人书中说：“以五十多年来对政事经济夙有偏嗜，其后多年复以此为专业，每多方探索，以察全貌，亲见亲闻既多，得自幕中有关人士者亦不少。阅时既久，排比剖析，求其特质；对于各政治派别及其人事之沿革演变，各重要事故之真实原因与关键所在，各经济集团之借助或依托于何种政治势力及其变迁，始具有概括之理解。”可见他不是学究式地即罗列现象地从事研究工作，而是“多方探索，以察全貌”、“排比剖析，求其特质”地有针对性地从事研究工作。无论对当前的问题还是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也无论对政治性问题还是对学术性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一般都是可以采用的。这就是马克

思主义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方法。恽逸群同志是掌握了这一方法并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的。正因为他走进书斋就是学者，并用正确的方法以人类知识的总和不断丰富自己的头脑，所以他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理想，逐步形成了坚贞不贰的信念。只有好学不倦的真正学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观察敏锐、立场坚定、文采奕奕的优秀学者，恽逸群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我和恽逸群同志曾经共同工作过一段时间——即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那时我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由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华中分局（苏北）不得不撤销，分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和分局一道，转移到山东地区，分局并入华东局，《新华日报》并入《大众日报》。记得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初冬，在一次华东局会议之后，邓子恢同志特别和我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向我介绍恽逸群同志的情况，因为华东局已决定恽任《大众日报》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他原任华中版《新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时我尚未和恽见过面。邓子恢同志很亲切地对我说，恽逸群同志是一个老同志，很有能力，很有学问，而且笔头很硬，一定可以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我当然很高兴。我体会子恢同志讲的“得力助手”的含义，就是要我充分发挥恽的才能之意。后来我们见面了，真是一见如故，加上他是武进人，我是丹阳人，是隔县同乡，乡音相似，所以很谈得来。当时报社驻地和华东局驻地相隔百余里，为了使报纸能及时反映华东局对战时各项工作的政策精神，报社需要有一位能力很强的同志常驻华东局。经华东局同意，这项任务就由恽逸群同志担任了。他本人也很乐意担此重任。这样，恽逸群同志就作为《大众日报》的副社长和副总编辑代表报社常驻华东局。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现在回想起来，印象特别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除了华东局特别重要的会议指定要我参加者外，一般会

议都由恽参加。他把每次会议情况都写信详细告我，而且每次都提了如何在报纸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加以贯彻执行的意见。我很尊重这些意见，并认真地在报社同志中加以传达和贯彻。可惜事隔三十余年，加上当时的战争环境，原信都已遗失了。

二、当时报纸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大都由恽就近请示华东局负责同志后撰写送来报社，特别是关于军事形势和土改政策方面的社论和评论，几乎都出自他手。可惜我没有他那样好的记忆力，不仅内容已无法说清，连题目也记不起了。只有关于莱芜战役的一篇社论（或评论），他说是和陈毅同志谈后起草并经陈毅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定稿的。这件事虽还有点印象，但毕竟也很模糊了，题目和内容都记不清了^①。报纸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起先一般都由我写，自从恽逸群同志来后，由于他常驻华东局的有利条件，主要就由他执笔了。

三、根据每日的报纸版面，当时他经常和我谈论如何办好党报，如何当好记者、编辑的问题。有时通信谈，有时当面谈。他笔很勤，也很快，所以写给我的信也很多，可惜都散失无存了。现在回忆起来，还能依稀记得较有印象的一点，就是他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四基五性”的主张。因为我当时也有些同感，所以有共同语言，因此印象较深，大体上还能记得。所谓“四基五性”，即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四个基本训练和五项具体要求。所谓四个基本训练，即：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训练；2、党在当前各项具体政策的基本训练；3、一般历史知识和调查研究当前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基本训练；4、文字表达能力（包括文法、文采等）的基本训练。所谓五项具体要求，即在新闻工作的实际活动中（采访、写稿、编辑等），必须遵守新闻报道

^① 这篇社论题为《运动战歼敌的又一光辉范例》，载于1947年2月26日山东《大众日报》。此文已收入本书62页。

的五项具体要求,它们是:1、真实性(对片面全面、夸大缩小、现象本质等而言,力求做到全面的、恰当的、反映事物本质的程度);2、正确性(对党的政策而言,力求做到从各个角度正确体现党的政策);3、针对性(对当前好坏倾向而言,力求做到批评坏倾向坏作风,表扬好倾向好作风);4、时间性(对拖拉和丧失时机而言,力求迅速及时而又恰当);5、生动性(对呆板无生气而言,力求文字、标题、编排、版面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以上就是我大概还能记忆的“四基五性”的简略内容。恽逸群同志当时归纳总结的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四基五性”的主张,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还是有用的。只有象恽逸群同志这样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包括党的和非党的新闻工作在内)的人,才能提出这样简练扼要的“四基五性”的主张,为从事党的新闻工作者之鉴。

作为一个高瞻远瞩、文笔犀利、成绩卓越的优秀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恽逸群同志更是当之无愧的。

《恽逸群文集》即将出版,谨就管见所及,草此短序,聊表我对恽逸群同志的怀念、敬慕和追悼的哀思。自从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之后,我们正面临着全党全民意气风发、同心同德、全力以赴的大好形势。要是恽逸群同志还健在,该多好啊!但正因为已逝世,我们不是更应该珍惜和学习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恽逸群文集》,而继承他的遗志,坚贞不贰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四化、为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勇往直前吗?!

学习恽逸群同志

石 西 民

年龄真是不饶人的，我日益感到记忆力衰退之苦。然而有那么几位已故的新闻战线的老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是那样清晰、生动、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际。不仅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每一思维往事，对他们的人格和成就的景仰感受，则一天天地增加，一天天地深刻。恽逸群同志就是这样被我思慕着的人中的一个。

恽逸群同志逝世转眼就是六周年了。他是很老的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他的一生历尽坎坷，然而自始至终，忠心耿耿，奋战不休，越到晚年越受折磨，越显出他人格高尚，学识、眼光和胆量都象耀眼的慧星那样闪光，而令人感到不可企及。我的头脑里首先浮现出将近半个世纪前我们首次相识时的种种情景。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之际，恽逸群同志在上海《立报》工作，担任编辑和主笔，我那时在上海《申报》工作，我们开始相识。那个时候，民族危机严重，救亡运动高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新闻界联谊会经常有许多活动，我们经常见面。恽逸群同志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诚恳、热情，性格开朗，贬斥时弊则见解犀利而又妙语如珠。总之，是一位非常可亲的长者。

我对恽逸群同志的尊敬，主要还是来源于《立报》的声誉。

《立报》是一份四开的小报，要在上海滩上打开一条生路，闯出一份有影响的、在社会上能站住脚的报纸来，可不是容易的事。《立报》却做到了。它一出版，在政治上高举着抗战的旗帜，内容充实，文字简短生动，编排也很精采，非常吸引人看。当然，《立报》办得好，也靠其他几位进步朋友的努力，不过恽逸群同志的劳绩是特别值得指出的。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一时震动中外。在这情况异常复杂的形势下，恽逸群同志接连写出好几篇评论，大胆地断言：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决不会成为西班牙第二（当时西班牙正在内战）。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他这判断的正确。恽逸群同志的胆识过人，怎能不使我敬佩之至呢！

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到：拿《申报》来与《立报》比，尽管论牌子老，发行量大，篇幅多等方面，《立报》是没有办法与《申报》比的。《申报》也有一些进步朋友在作出种种努力，可是同《立报》的坚强精干比，《申报》显得多么老大、臃肿、虚弱啊！尽管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我认为这只是说明《申报》也在进步，而并不动摇我对《立报》办得比较好的评价。

抗战爆发后，我们天各一方，长时间不通音问。后来，知道恽逸群同志到了苏北解放区，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随后内战爆发，他撤退到山东，主持《大众日报》笔政。这段时间大家都在从事新闻工作，可一直没有见面。他在苏北解放区写的《蒋党真相》，以及后来在《新民主报》编写的国民党战犯简历，我都是看到了的。我当时就很为他的博闻强记和才华横溢所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有过相当长的一段在白区参加革命的经历，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工作也十年以上了，但是我绝对写不出《蒋党真相》那样的书。我在新华总社工作，经过我的手发出国民党战犯名单的重大新闻，但我也写不出恽逸群同志连夜赶写的那四十多名战犯的全部简历。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缺少他那种功力。博闻

既比不上，也缺少恽逸群同志那种长期积累资料和深入钻研的精神。尽管有人指出《蒋党真相》一书中所写战犯简历尚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恽逸群同志是在战争环境中，在极度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学识渊博，勤于搜集资料，往往都是一个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条件。恽逸群同志十五岁以前就已通读了四书五经、《史记》等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他喜爱历史但不泥古，非常重视当代军、政、经、文各方面的人物和重大事件以及各种掌故的资料搜集。恽逸群同志主张在“通今”以“博古”的基础上，再做到“博古”以“通今”，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我想：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特别要留心当前的国家大事，勤于调查研究，积累资料，在这许多方面，恽逸群同志确实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好榜样。如果象恽逸群同志那样惊人的记忆力也可以学习到的话，那更是如虎添翼了。

解放以后，我与恽逸群同志又在上海见面了。他主持上海《解放日报》，我在南京办《新华日报》，有时为了讨论宣传工作，我们在上海相叙，多年阔别，他却风采依然。万万料不到，不久，在“三反”运动中，他受到了惨重的打击。身居高位的坏人，抓住他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而且既不核实证据，又不允许本人申辩，就一棍子打下去，党籍也被开除了。在他的案件中，记得其中包含一个解放前他认识的资本家的案情在内。恽逸群同志曾以解放日报社的钱借给那位办实业的资本家去经营矿业，后来失败了，这就是他的“罪状”之一。其实这件事在恽逸群同志方面，丝毫没有不光明之处。我记得那位实业家曾到过南京，也到新华日报社来找我，他拿来了恽逸群同志的介绍信。恽逸群同志在信中说，他这位老朋友要在南京近邻一个地方办小煤矿，他认为这对国家办工业不无好处，希望我给予帮助，如果可能的话，也请我在新华日报社设法在经济上支持他一下。

长期在白区工作过的人，自然知道，没有各行各业的朋友的交往和掩护，是一天也生存不下去的。困难时的朋友，总不能在胜利后一脚踢开吧！具体情况不作具体分析，这是多么坏的作风。恽逸群同志从此就遇到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由于潘汉年冤案的牵连，他被抓入牢中，被判为“反革命”。十年后释放，又碰上所谓“文化大革命”，被流放在江苏阜宁一个中学充当图书馆管理员，一直是“专政对象”，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获自由，不久也就去世了。

恽逸群同志生前最后这二十多年，是他最坎坷的一段生命史，而他的人格形象的高大，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以及他锐利的洞察力，他那无畏的战斗精神，都升华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实在值得后死者学习，也实在值得年轻一代新闻战士学习，而首先是向他学习如何做人。

恽逸群同志身居逆境时给友人的信中说：“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的确，类似“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这八个字的名言，出诸我国古代好些书籍文章中，可是一经考核，真正做到的实在并不多见。恽逸群同志在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又说：“尽管被开除党籍，被打成反革命，我始终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工作，只是限于地位，使不上力的时候，无可奈何！”其实，后面这封信中所说的，恰恰是逸群同志高尚品质的最确切的自我介绍，也是他所以能善处逆境，做到他自律的八个大字的原由的最好说明。一句话：生命的意义，在恽逸群同志的心目中只有为人民而活，为真理而战，其他一概不计较。

具有这样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够目光如炬，象照妖镜一样照出林彪、“四人帮”的丑恶原形，并且敢于撰写《平凡的真理》这样切中时弊的文章，尖锐揭露当时“造神运动”的本质。也只有具有这